

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与“国际化”问题

□刘江凯

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或者“国际化”问题是当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折射，中国在重新进入世界新秩序后必然会在文化想象与构建方面有相应的历史表现。体现在当代文学方面，一方面是已经不断出现的各种“历史化”表现，另一方面主要就是刚刚开始的世界维度的“经典化”征程。文学里有时代的新声与号角，有现实的反思与批判，更有人性的观察与沉淀，当代文学有责任帮助当代人更好地理解当下的自己、社会及世界。

我们常说一时代有一代之文学，而一个时代的文学必然也会和其社会现实发生紧密而深刻的联系。那么当代文学的现实和趋势是什么？虽然有很多角度可以展开，但我想重点围绕着“当代性”和“国际化”两个关键。

当代文学的“当代性”问题

近年来当代文学与现实之间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学究竟应该如何表现和处理当下现实？应该如何写出既能反映中国时代发展，切中当下国人心态，引发社会普遍共鸣，既有鲜明中国特色，又有人类共同经验，融现实性、艺术性、批判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

我曾在2013年关于余华《第七天》的一篇文章里提出过一个观点：对当代文学的讨论，除了“文学性”外，还应该建立在“当代性”之上。当代文学缺少成熟的“当代性写作”：既能容纳当代生活内容和精神特点，又能艺术地处理好文学与现实关系，把文学性和当代性完美结合在一起面向未来的写作。中国当代文学整体上具有“文学性”有余，“当代性”不足；作品内容“历史”叙事有余，“当下”现实不足的特点，作家在文学性和当代性之间或者说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处理上普遍存在一种“难以相处”的悖论现象。

如果大家例数一下能够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实绩名家的代表作品，就会发现，大多数作品的人物内容、或者是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会和当下现实保持一定的“陌生化”距离。而那些直面当下社会现实的小说，比如所谓“底层文学”或者反腐、都市言情小说等，往往又很难达到一种理想的艺术高度。

所以我觉得当代文学一定要努力突显“当代性”——这个使当代文学区别于其他时代文学最核心的概念。不论是文学创作或是批评，对于当代性的欠缺与忽视有可能导致文学和时代一定程度的脱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

为余华的新作《第七天》延续和强化了从《兄弟》就开始的“当代性写作”特征，其中的努力和问题非常值得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

对“当代性”的重视是近年来许多当代名家的共同表现。比如莫言获奖之后，最近发表的一系列新作，明显的一个变化也是“当代性”的突显。尽管这批新作在叙事上几乎都采用了“过去——现在”互相穿插、嵌套、勾连的叙述手法，但其中的“当代性”和时代感却非常强烈。比如《天下太平》里关于环境污染、录制视频传播正能量等描写；《诗人金希普》里金希普的各种自我吹嘘与包装等表现；《表弟宁赛叶》里以醉酒对话的方式形象地对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的发展进行了一次“侧写”，这种以“个人生活侧写社会发展”的方式在《等待摩西》以及《地主的眼睛》里都有表现。从这些作品里可以鲜明地感受到某些人物和复杂的时代气息正在从历史中退出和进入。虽然作家们表现“当代性”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从贾平凹、格非、苏童等作家的近作里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感受到这种变化。当然，在强化当代性或者现实主义的同时，我也觉得当代文学同时非常有必要重新召唤文学的“先锋精神”。事实上，如何用先锋精神以艺术的方式去表达当代现实，窃以为是对包括莫言在内当代作家们的整体挑战，限于篇幅，这里只提出问题，不再详细展开。

当代文学的国际化与中国立场问题

接下来讨论当代文学的国际化与中国立场问题。

其一，不断历史化与国际化是中国当代文学近年来显著发生的事实，也是当代文学世界维度的经典化必须经历的两条路径，更是中国重新进入世界新



秩序后在文化想象与构建方面的一种关系折射。“在世界中经典化”首先意味着我们对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期待和观察视野从中国拓展到了世界，这样的变化会让许多在国内经典化程度很高的作家，不得不经历更为复杂的再经典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包括获诺贝尔奖的莫言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可能才刚刚开始世界范围内的经典化历程。

其二，当代文学的国际化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还应该包括文学批评与研究。相对于海外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参与，中国学者自觉地从汉语边界走出，进入世界视野展开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将会改变之前“被代言”的现象，对当代文学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国内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在而不盛”的历史特征和“存而不明”的研究现状与其“跨界”性密切相关，突然出现的巨大空白和前期研究经验不足的矛盾，以及巨大研究热情的涌现导致了当前一系列复制性、平面化等研究问题。

其三，中国文化“走出去”，建设中国“软实力”，加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应该和必然的出路。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应该是在坚守中国立场的前提下努力做到：各归其所，和而不同。即“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理应成为当代文学重要的研究内容，同时兼顾海外汉学、翻译学、比较

文学等学科的方法与成果，在“和而不同”的精神下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局面。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涉及海外传播的学科，比如中国哲学、历史、美术、音乐等等，以研究对象去统一各种跨界（不同的民族、国家、语言、文化等）问题，将会极大地拓展传统学科的边界，彻底激活许多原来不曾想象的问题，形成难度更大、挑战性更强但可能性也更多的繁荣研究局面。

当代文学的“世界经典化”问题

从近年来关于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经验与成果来看，面对海外文化界，加强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海外传播与影响力，最有效的方式大概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前提基础性的：即不论是作家作品，还是学术研究，请用实力说话，请拿出好作品。否则我们得到的不过是人家礼貌性的社交回应。套用现象学的那句话说就是还得“回到事物本身”或者说“实事求是”的精神——拿出令人信服的优秀成果来。“诗人金希普”们可以骗得荣誉、财富、爱情甚至权力，却无法获得真正的承认，更有被当众戳破或者羞辱只是因为别人没有教养而已。文化归根结蒂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个人自由选择，尤

其是面对海外文化传播，那些国内自娱自乐的方式很难行得通。

第二条是必要也是重要的辅助路径：即国家力量要以更专业的方式大力提供扶持计划。现在我们的政府有意愿也有能力加大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方面的支持，但在运作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何以更合理的方式让专业力量去发展自己的海外影响力，既是一个机制管理的系统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的问题。

总之，中国自身的现实问题或世界的现实关系是什么样，文学及其研究就必然面临相应的表现与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或者“国际化”问题是当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折射，中国在重新进入世界新秩序后必然会在文化想象与构建方面有相应的历史表现。体现在当代文学方面，一方面是已经不断出现的各种“历史化”表现，另一方面主要就是刚刚开始的世界维度的“经典化”征程。文学里有时代的新声与号角，有现实的反思与批判，更有人性的观察与沉淀，当代文学有责任帮助当代人更好地理解当下的自己、社会及世界。当代文学不断生成的特征注定催生新力量的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代人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使命。新时代呼唤新崛起，新力量创造新成就；历史发展，浩浩荡荡，承前启后，势不可挡。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博弈与未来10年的中国文学

□李广益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是民族复兴大步向前的时代，也是诸多尖锐问题无从回避的时代，是中国更深入地参与世界的时代，也是世界更多地寄望于中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当代中国以其无比广阔而丰富的现实，召唤着与之相称的深广文艺呈现。如何容许并鼓励中国文学乃至文艺以充分的诚意、恰当的形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融文化自信于文化自信，则是中国文化在未来10年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

进入2018年，中国人清晰地感受到了国际形势的变化。朝韩破冰，“金特会”提上日程，金正恩连续访华，半岛对峙局面在令人绝望的僵滞暗夜中透出了曙光。正当东北亚格局风向好转却仍变数丛生时，更大的冲击扑面而来。中美在贸易问题上针锋相对数个回合之后，美国终于以制裁中兴的方式祭出了杀手锏，从而引发了中国社会对“芯”病的普遍担忧，以及对于IT产业、科技研发乃至国家发展方向的全民热议。

无论中美贸易争端是加剧还是休战，这一冲突都是表象。改革开放40年来，长期高速的经济发展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大提高，世界格局也为之逐渐改变。和历史上所有的霸权国家一样，冷战之后独步天下的美国对于挑战者保持着猜忌、警惕和防范，最近终于将矛头明确指向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首份国情咨文中，将中国明确地界定为美国的“对手”（rival），而不是此前政治辞令长期沿用的“竞争者”（competitor）。或许我们倾向于对“大嘴”特朗普的修辞付之一晒，视之为讨好选民的姿态，但若对一段时间以来的美国舆论有持续的追踪和观察，不难发现美国各界对华态度的整体性转变。美国社会主流认为，中国既具备不断接近美国的整体实力，又有不受后者控制的独立主权品格，对美国主宰的单一世界体系构成了事实上的“威胁”。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出台了《台湾旅行法》，这是触碰中美关系红线的严重行为，但在美国国会通过时却异常顺利，由此亦可窥见美国对华战略的动向。未来7到10年，既是中国切实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时期，也是美国多方发难以阻遏

中国真正成为制造强国的时期，如何斗而不破，周旋应对之余步伐不乱，将是对中国战略智慧和定力的重大考验。

包括中美角逐在内的国际博弈日趋激烈，这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或者说中国文学能够以怎样的方式去回应呢？很长一段



时间以来，当代中国的文学书写在探索人性与历史深度方面的能力和成果，明显超过了拓展世界视野的成就。走马观花的猎奇式游记散文，并不能带来对于异域的真知灼见；除了张承志等极少数作家，我们很难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看到对宏观世界的敏锐感知和深刻认识。值得注意的例外是科幻作家，因为科幻文类的独特属性对作者的整体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幻作家陈楸帆谈到，“科幻自身的类型特点，决定了它是从人类文明整体出发来思考问题、响应危机，比如《三体》作者刘慈欣的很多作品便是如此。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科幻写作一直以来的立场，从这个角度看，科幻比纯文学更具世界性。”在科幻作家的全球化视野中，一个村庄不再是简单地自成一体的乡土社会，而是置身世界市场，受到林林总总诸如新技术应用、能源价格变化、国际冲突与妥协的影响，从而召唤着新的知识、修辞和想象。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期待在格局开阔的科幻文学以及网络文学当中看到更多对于国际博弈的直接想象和思考。

当然，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博弈并不仅仅是各国政要的折冲樽俎和战乱之地的鲜血硝烟，而会在一个国家内部充分显现其效应，这就使得一般意义上的现实观察和书写，也可以具备回应大时代的力量。为了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改变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大力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衰落是必然之事。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使得不少跨国公司产生了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冲动，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升又会使多数企业打消这样的念头——毕竟，别的国家很难像中国一样具备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物流体系以及优越的政策环境，更不用说世界第一的大市场。当企业越来越多地使用工业机器人来完成流水线工作，乃至更深入地利用人工智能来运作和管理，不仅蓝领岗位会大大削减，白领的失业风险也会增加。制造业实力的提升，一般而论当然是强国利民的好事，是中国应当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的功业，但因此而产生的失业之类社会问题，也无法一笑置之。在当代中国，人工智能所代表的生产力进步，能否使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对社会变动最缺乏预见力和抵抗力的底层人民普遍获益？“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这样的困境会因为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的降低而加剧，还会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因进一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应用而缓解？这些饶具现实意义、关系着千千万万国人身心如何安顿的问题，很值得文学追问。

国际博弈以高科技竞争的形式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还体现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层面。当代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显现，莫过于智能手机。自从2007年iphone初代掀起智能手机风潮以来，短短10年间智能手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革命性的变化，低头族、移动互联网、APP、抢红包、群主、王者荣耀、语音输入、直播……从2G到4G再到即将到来的5G，通讯技术及其载体的日新月异已经成为社会变迁的原动力之一。上至民族产业走向世界的象征，下至

菜场饭馆的移动支付，智能手机在中国人日常用品中的普及程度已经首屈一指。亦因此，我们需要思考，逐渐成为“中国骄傲”的华为等国产品牌手机，以及个人电脑、穿戴装置、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等，能否在“万物互联”的5G时代摆脱国外厂商的技术钳制，创造一种更能满足广大中国人民身心需求的生活样态？物联网在带来更多便捷的同时，在个人隐私、家庭关系、社会交往、青少年成长等10年来变化与问题丛生的方面会带来怎样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一个性价比糟糕的外国品牌拥有足以营造虚荣乃至诱人的高附加值，这种情形会不会发生逆转？尽管上文提到的智能手机等科技产品在当代中国文艺作品中举目皆是，但刘震云的《手机》（2003年还是前智能手机时代）问世15年来，似乎并没有真正有分量的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因科技应用发生的变化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事实上，在今天这样一个高技术社会，尤其是多数作家生活其中的大城市，进行这类书写并不需要太多未来学式的想象力，考验的仍然是写作者的观察能力和知识储备。

如果说扣住科技去书写社会仍是一个较高的要求（其实对于有抱负和雄心的作家来说并不过分，马克思所谓能从《人间喜剧》中的经济细节方面学到比上学时从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更多，便是此意），未来10年间的社会情绪则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者”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把握和呈现的东西。国际博弈从未停止，只是未来我们的感受可能更为切近和真实。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是民族复兴大步向前的时代，也是诸多尖锐问题无从回避的时代，是中国更深入地参与世界的时代，也是世界更多地寄望于中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当代中国以其无比广阔而丰富的现实，召唤着与之相称的深广文艺呈现。如何容许并鼓励中国文学乃至文艺以充分的诚意、恰当的形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融文化自信于文化自信，则是中国文化在未来10年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